



治学的门径与取法

——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Methodologies of Historical Writing:
Sources and Historiography o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桑 兵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治学的门径与取法

——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Methodologies of Historical Writing:
Sources and Historiography o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桑 兵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 桑兵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5097 - 5941 - 7

I. ①治… II. ①桑… III. ①史学 - 研究 - 中国 - 近代
IV. ①K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8179 号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

治学的门径与取法

——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著 者 / 桑 兵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宋荣欣

责任校对 / 李 俊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5941 - 7

定 价 / 69.00 元

印 张 / 21.5

字 数 / 348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摘 要

历来讲究治学方法，大抵分为二途，专论往往流于纸上谈兵，实用则浅学不易捉摸。本书依照前贤指示的途辙，根据治学所悟，力求提供一些实用有效的运用材料、研究问题的基本门径和办法。主要包括：一、近代中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的通论与专论；二、各种类型史料的认识与应用的分说；三、各个具体研究领域、方面的史料与取法的探究。而治学方法的基本所在往往也是高明所由，所以良法必须学识功力兼备才能领会把握。近代以来，分科治学，各种时髦方法，大都生成于域外，移诸禹内，难免具有统系却格义附会，导致越有条理去事实真相越远。一味面向后学新进的趋时横通，更是犹如江湖术士的自欺欺人。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还须恪守古训，读书为己，严格自律，以免治学则无知无畏，教书则误人子弟。

目 录

绪 论	1
一 两种史法	2
二 学界江湖	7
三 系统与附会	12
四 为己与自律	19
 第一章 近代中国研究的现状与趋向	23
一 现状与问题	23
二 胸有成竹与盲人摸象	31
 第二章 晚近史料的边际与史学	39
一 史料的类型与规模	40
二 史料繁多对史学的影响	45
三 史料的编辑出版与史学的扩展	50
 第三章 治史的贯通与滞碍	58
一 治史不宜归纳，而要贯通	59
二 分科教学与治学的局限	64
三 放眼读书与执简驭繁	68
四 学术交流与评价的误区陷阱	73
 第四章 各类史料的解读与运用	79
一 日记内外的历史	79
二 函电解读与历史研究	95
三 历史档案的属性及应用	103

四 报刊的史料价值	113
第五章 近代中国研究	123
一 用通史的眼光研治近代史	123
二 扩张辛亥革命史的史料与史学	127
三 超越发现时代的民国史研究	144
第六章 比较研究	150
一 近代中外思想的互动与比较	150
二 华洋变形的不同世界	162
三 中西文化关系的隐与显	166
四 近代中国国字号事物的命运	179
第七章 学术的历史	184
一 近代学术的清学纠结	184
二 分科的学史与分科的历史	191
三 学术理路	201
四 学术批评	206
五 地域学术因缘	214
第八章 人物研究	219
一 人物研究的取法	219
二 材料与本事	230
第九章 教育史研究的观念与取材	238
一 古今中外的“教”“育”	238
二 大学与近代中国	244
三 教育期刊与教育统计	248
第十章 女性研究	257
一 因缘与基础	257

二 女性研究与近代中国	260
三 近代中国女性研究的观念与实事	270
 第十一章 “民族”与“边疆”问题	285
一 中国民族、边疆问题的观念与实事	285
二 汉族与少数民族	288
三 边疆与民族	290
四 中华民族是一个	292
五 外来理论概念的再调适	294
 第十二章 本意与演化	298
一 理解本意 寻绎演化	298
二 问题与主义	302
三 解释一词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308
四 法制史研究的比较与比附	314
 征引文献	320
 人名索引	328

绪 论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上穷碧落下黄泉，
两处茫茫皆不见。

——白居易《长恨歌》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题西林壁》

王国维关于成就人生的事业学问须经历三境界说，世人耳熟能详。上引唐宋三诗，则似与今日治学的三种状态神似。前者凭空天降，横逸斜出，无知无畏。其中则动手动脚，踏破铁鞋，实则家有金山，却沿门托钵。后者各以一定之规裁量所有，看似清晰，其实始终茫然，且不自觉。治学以及读书，必须熟悉前人研究、相关材料以及事实问题，才有可能拿捏得当，三者缺一不可。否则谨慎者难免心中无数，忐忑不安，摸着石头却过不了河，大胆者索性扫除羁绊，打倒前人，凿空逞臆，以便随心所欲。即使见识高明，也有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智者之失，乃至不温故而欲知新的臆论妄言。诸如此类的超越创新，不知前人何在，也就很难真正突过，充其量只能沉浸在坐井观天的自娱自乐之中。

历来讲究治学方法，大抵分为二途，专论往往流于纸上谈兵，实用则浅学不易捉摸。良法必须学识功力兼备才能领会把握，一味面向后学新进

的趋时横通，犹如江湖术士的自欺欺人。近代以来，分科治学，各种时髦方法，大都生成于域外，移诸禹内，难免具有统系却格义附会，导致越有条理去事实真相越远。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还须恪守古训，读书为己，严格自律，以免治学则无知无畏，教书则误人子弟。

本书各篇，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有关近代中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的通论及专论；其二，关于各种类型史料的认识与应用的分说；其三，关于各个具体研究领域、方面的史料与取法的探讨。虽然因缘各异，长短不一，内容则主要涉及史料的规模类型、解读应用以及与此相应的治学的门径办法。以往凡有著述，都要专门用心写一绪论，说明研究办法以及书中未能备述各事。本书多少有些例外，各篇大都是相当于绪论的各种解说，再写绪论，似乎多此一举。因此只是简略交代写作因缘，并略做申述。其中有些看似题外话，却是读书治学的应有之义，读者不妨心领神会。至于各自悟出什么，全凭因缘造化。

所谓近代中国，为一相对概念，随着时间的流逝，具体时段难免有所变化。原来指为现代史的1949年以前部分，如今普遍被划入中国近代史的范围。相比之下，晚清民国的概念较为固定，但也并非没有异议。晚清的终点大概清晰，起点就有些含糊，至少未必得到公认。至于民国，海峡对岸的学人对其下限也会有所意见。晚近的说法，今人少用，民国时期的学人则不乏使用者，其上限与下限都较为模糊，尤其是上限，或许涉及清初乃至晚明。方便之处，一则避开近代史开端的分歧；二则防止将清史截然分为两概，不相连贯；三则避免治近代中国史上不出嘉道之讥。尤其是关注和阅读史料方面，过于清晰分界，等于画地为牢。使用各种概念，看似混淆，实则语境不同，含义有别，强行一律，反而体现不出差异。集合概念大都后出，不用则难以表达，用则容易引起歧义，关键在于是否有碍于认识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作为方便名词或因缘时空关系把握分别，就不至于产生混淆，以致增减害意。而从定义出发，虽然裁剪整齐，却往往捉襟见肘，与事实不符。

一 两种史法

本书的写作，缘于友人进言，可写些文辞浅显的短文，为初学后进提

示读书治学的门径。其实此类书前贤早已具备，毋庸置喙，而且要想深入浅出而不逾矩，实为难上加难之事，并非如一般所以为的那样可以信手拈来。深入则难解，浅出则乱来，不易兼而有之。不过当时也心有所动，并拟就数十则条目，从求师谈起，逐层递进，显示读书与治学的取径途辙。只是动起手来，犹豫再三，还是改变初衷，不欲刻意追求浅显易懂，雅俗共赏。因为学术研究，必须取法乎上，才不至于等而下之。而良法必然高深，不可专为小夫下士乃至坊间流俗道。此非故标高的，但凡针对一般时趋立论的，立意本来不高，结局势必陷入对立面的窠臼。而基本的途辙门径，看似简单易行，实则暗藏玄机，听授者程度悟性不同，领略各异。从者众与和者寡，高下立判，少有例外。

王国维谈哲学，有可信则不可爱，可爱则不可信之说，这样的两难也可以放大到各类学问。就清代以来学术的取径表现看，大概都有可爱与可信的难以兼得。沟通之道，是将可信之学做到可爱。所谓可爱，并非人见人爱的万人迷，而是情有独钟的生死恋，是潜心向学者心仪的挚爱，不是一般读者兼具的泛爱。讲座之类的耳学，对于听授者而言，大抵为可爱之学，图个热闹，刺激一下感官，振奋一下精神是可以的。循此要想登堂入室，则很可能是缘木求鱼为多。固然，讲者也可以不顾听众感受，径直宣讲其可信之学。其结果势必听者藐藐，门可罗雀。要使从学者能够领悟可信之学的可爱，绝非讲座之类可以成就。

历来讲治学方法大体有两种，一是读书治学有成，述其心得，所言不是空谈方法，而有应用的成功范例，皆有裨于治学的实际，可以助长功力；一是专讲方法，犹如纸上谈兵，花拳绣腿，说得天花乱坠，打得刀光剑影，临阵却不切实用，反而可能误导。近代新进学人颇为尊奉的章学诚，在乾嘉学术系统中便属于专讲史法一类。其所讲古代学术，谬误甚多，而其侈谈如何治史修志，下手却鲜有成功实例。如此还一心想以金针度人，难免招来无数的物议。若非近代学人比附西学，误解科学，以为章氏所言符合西洋的科学化准则（其实西洋不存在公认的科学标准，也没有不言而喻的普适科学方法），遂被再发现重认识，其学术地位更加可议。

专讲史法与治学心得不同，前者不仅有凿空逞臆之嫌，而且不无以讹传讹之处。教条般的高头讲章，看似头头是道，井井有条，实则于治史百无一用。解读材料研治问题，必须讲究有效实用，避免夸夸其谈。凡不能

以所讲方法做出高明具体研究者，充其量无非章学诚的翻版再世。而读书得间的领悟，哪怕只是一孔之见，也有助于解读材料，研究史事。前贤好以序跋的形式言说其心中推许的理念方法，这些序跋，作为对相关著述的评介，未必完全适当，或是不免有所隐曲，而作为心中期许的标的，却往往能够体现高远意境。尤其是那些出类拔萃的高人雅士，所言大都经验之谈兼高妙之论，品味隽永，收效显著。相比之下，专门论述治学方法的著述，虽然不乏常识通则，反倒显得浮泛疏廓，或以域外之陈言，为华夏之新知，夹杂各种横通之论，只能蒙骗小夫下士。若是应用于实际的读书治学，则非但无济于事，还可能使人误入歧途，以致不可救药。

有鉴于此，不必侈谈史学理论和方法，而要依照前贤所指示的途辙，根据治学所悟，提供一些使用材料、研究问题的取径做法。这些行之有效的取径和做法，或者本来不过读书治学的基础门径，且经前贤反复论道，卑之无甚高论；或者为近代学术大家治学的良法美意，贯穿体现于其代表性著述之中，必须反复揣摩，以求心领神会。二者看似高下有别，但治学方法的基本与高明其实相辅相成，基本所在往往也是高明所由。即使技术层面以下的规则，如果理解到位，拿捏精当，也可能成为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当然，在专讲史法的人看来，前贤的经验心得反倒有不像乃至不是方法之嫌。

听授者大体也有两类，一是读过书，有过治学的实践，一是只读过教科书，充满耳学，却从未或很少眼学。按照钱穆的说法，方法是对读过书的人说才有用，向没有读过书的人谈方法，往往有害无益。受清季以来推行的国民教育的制约，无论学习多么系统，读完书再做学问已是奢求。而有效实用的方法，是治学者的心得，没有读书的经验，则无法判断深浅优劣高下，很难体会其中奥妙，甚至越是浮泛，越有共鸣，反之，则无动于衷，无所适从。倘若新进以为先学会了方法再读书治学，可以事半功倍，则犹如试图在岸上学习游泳的各种姿势要领，然后期待下水就会劈波斩浪一样，不仅奢望，而且无稽。尽管诸如此类的误人子弟如今在大学里已经并非异态，毕竟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史学尤为发达，治史方法极其讲究。近代以来，虽然社会整体发展相对滞后，文史之学依然可观。本书所讲方法，大体是学习历代读书法的要旨，揣摩近代学人治学的苦心，移植来研治史料极大

丰富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治学必须先因而后创，能够将前贤已知承接下来，才有可能发展创新。而前贤所用的方法，已经其实践证明行之有效，揣摩领悟，善加运用，功力可以大进。当然，前提之一，应当切实准确地把握，若良莠不分，也会南辕北辙；前提之二，应恰当合理地运用，否则良法未必当然成就美意。若是接不住而试图超越，只好破字当头，抹杀前人，以彰显自己。

近代学术大家卓有成效的治史方法，是在宋代史家方法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而宋人治史，尤以长编考异之法最为精当。此法在近代的运用，概括者如沈曾植以俱舍宗治俱舍学之说，稍详者如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

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①

中国历史文化，特重政治伦理，所谓思想学说，多有具体的时空人事因素，少有形而上的抽象，研究此类对象，不能简单地直面文本，望文生义。要想全面认识蛋的外观内里，来龙去脉，还必须追究下蛋的那只鸡。只有了解下蛋的鸡，才能对其所生之蛋认识透彻。

更为详尽的发挥，则见于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比较不同的史料以求近真并得其头绪的论述。^②三说详略各异，要旨则一，认真揣摩这一治史最根本也是最紧要的方法，并且根据具体研究对象的千差万别而灵活运用，不仅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而且有望臻于化境。

在具体研究领域，各学术大家通过其代表性成果从不同层面展现了治

① 《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第262页。

② 详见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收入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文字有所调整。

学良法的成效，诸如顾颉刚的《孟姜女的传说》，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梁方仲的《一条鞭法》，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等，问题有别，而主旨一致。陈寅恪将中国固有的长编考异、合本子注与域外比较研究的事实联系各法参合运用，注意章程条文与社会常情及其变态的关系；傅斯年用语学与史学的方法探讨事物的发生及演化；钱穆注意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的联系和分别；顾颉刚注重史事的时空推演关系等，均可视为体现长编考异比较之本旨及其变相。

更为重要的是，以长编考异之法研治历史，既是基本所在，也是高明所由，既有助于矫正时下的种种学风流弊，又能够上探领悟前贤治学的精妙，实为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所在。其主要准则有二，其一，解读史料史事，必须遵循时空人等具体要素，凡是脱离具体时空人的事实联系依照外来后出的各种观念架构拼凑而成的解读连缀，都是徒劳无功地试图增减历史。其二，历史的内在关联并非罗列史事即可呈现，而是深藏于无限延伸的史事错综复杂的联系背后，必须透过纷繁的表象寻绎联系的头绪才能逐渐认知。

史学要在讲究事实，历史已经过去，无论怎样认为，均不可能增减分毫。因此，治史所重不在如何认为，而在恰如其分地解读史料，适得其所地呈现史事，从各种层面角度显现前人本意和史事本相以及相互联系，并且表明依据什么说是如此这般，所用论据是否经过前后左右上下内外的反复验证。呈现事实及揭示内在联系本身就包含认识，如何述说同时也就是展现学人的见识。不能重现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的所谓认识，至多只能说是从阅读历史获得灵感的自我表现。在此类主体的眼中，历史无非和文学作品一样，一旦形成，就离开作者而独立，可以从中获取种种连作者也意想不到的灵感。至于历史本身究竟如何，反而无关紧要。

历来学界争鸣，好以“我认为”扬己抑人，耸动观听，一般学术综述以及各种论著所提及的前人先行研究，每每好称引各自提出的论点，而不深究这些论点的依据以及所凭据的是否经过验证，即为重视“认为”的显例。其实各式各样的认为，并不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学问虽然可以见仁见智，却不能随心所欲，检验的标准在于本事，以及借由何种依据如何接近本相。历史已经发生，不会因为后人的意识而改变，凡是符合事实的，都不取决于个人如何认为，而形形色色的认为无论怎样高谈阔论，若与事实

不符，则都是错误而不会影响历史事实，只能干扰淆乱对于历史的认识。也就是说，于史事而言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会作用于如何呈现历史。由于学人的述说各自呈现来的史事常常因人而异，如何还原历史似乎成为无法验证之事。实则这些后人的看法五花八门固然令人无所适从，众口一词也未必就是事实俱在。善读者透过罗生门似的各种记录说法，可以逐渐近真并得其头绪。若是主观过甚，就只能快刀斩乱麻，剁碎了再来任意牵连。无论如何，史事本相与前人本意才是衡量检验后人认识当否高下的准则尺度，而不能本末倒置。

一般而言，学问之事，越是高明则懂的人越少，如果用多数取决的办法，被否定的很可能恰是远见卓识。而多数认定的观点即使未必正确，一定时期内仍然具有影响力。这与各式各样学术评价的道理大抵相通，抛开一切利害牵扯，也有见识高下之别。在高深的层面，真正的权威只是少数。权威的意见固然难免错误，但几率较低。所以学术研究只能自由，不能民主。民主式的学术容易导致平庸。

人们求知，存在相反相成的两面，一方面将既有知识当成裁量的尺度，一方面则作为吸收新知和开发智慧的工具，这是出现事实与认识反差的要因之一。盲从既有知识就是成见，以之为评判的规矩尺度，很容易自我禁锢，做了自身知识缺陷的奴隶，无数的论断，都不免流于自以为是的放大与泛滥，见仁见智成了分不清是非正误的遁词，从而失去进步的动力。

二 学界江湖

无论如何取法乎上，本书的用意之一，仍是作为入门书写给新进看，虽然不以专教小夫下士为荣，毕竟要显示一些基础门径。求学首先要会读书，少了童子功，又有体制的压力，无法放眼读书之后再做学问，在不得不为写书而翻书找材料的同时，如何避免偏蔽，就有赖于师。所以原来拟定的条目，是从求师开始。当然，若为师也偏于一隅，弟子就很容易坐井观天。

近年来，大学为何不出大师的问题令各方相当纠结，尤其困扰着大学及其主管部门的当政者。其潜台词是大学应该出大师，而且以前也曾经出

过不少大师。其实这两方面均有可议。在堪称国学大师的章太炎看来，大学连学问也不出，何况大师？至少从中国传统学问的研究看，此言不无道理。章太炎以为，学问之事，在野则盛，在朝则衰，所以官学始终不及私学。而在今日的体制之下，即使不能说学人和学问都出自大学，也很难说大学以及体制性科研机构以外的学问超过大学，甚至很难说大学以外还有多少学人。严耕望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言他人所不能言，包括不敢言和不会言两种。如果只会讲不便说的事理，意在耸动一般受众的视听，显然很难称之为学问。

谈论大学与大师的话题，已经过滥而有流俗之嫌。不过，转换思路，不论大学应否、如何培养大师或是为何还没有培养出大师，而是深究一下大学怎么会与大师扯上关系，其中有多少误解和扭曲，倒是颇有意思，且为求师一节的应有之义。

所谓大师，本是古代的官名，后为佛教的尊号及谥号，俗世间有指称学或术高明者。将大学与大师联系到一起，时下指认的肇始者是梅贻琦。1931年底，梅贻琦由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回国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说中，为了强调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仿孟子故国说，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说当时未必引起广泛反响，而近年来却反复征引，到处流传，作为大学教育今不如昔的铁证，甚或变成所谓世纪之问。可是不知不觉间，意思有了不小的改变。人们普遍质疑在大学的重点建设热潮中，只见大楼起，不见大师出。殊不知梅贻琦的大学有大师，所指是要聘请好的师资，并未赋予大学以培养大师的责任。在梅贻琦说那番话的时代，大学不要说培养大师，连能否出真学问，在堪称大师的章太炎等人看来，也还大成问题。近代中国的大学，官办（包括国立省立）者无非庙堂之学，私立者大行妾妇之道。况且大学不过是人生中的学习阶段，即使拿到博士学位（1950年代以前国内大学尚无此设置），至多只是奠定基础，就算潜力无限，距离大师也还相当遥远。所以梅贻琦说办大学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这是合情合理之论。若宣称要培养大师，便成妄言。

此事从梅贻琦长校的清华大学本身就能得到印证。清华开办国学研究院，从全国各处招收来的学生大都已经学有所成，相对于刚刚升大的清华本科生，功力不止深了一层，又得到几位名师的亲炙，足以成家者甚多，

帮助清华一举摘掉无学的恶名。可是不要说毕业之际，就算功成名就之时，有哪一位敢以大师自居？国学院出身的姜亮夫就承认，直到晚年，他还是不懂陈寅恪当年上课所讲的内容。国学院因为请不到名师等原因而停办后，陈寅恪继续任教于清华大学的历史、国文两系，其在历史系开设的课程，因为程度太深，学生难以承受，不得不再降低难度。可见让大学培养大师，多少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时下一些名校的大师班，以及虽然没有贴上标签，却宣称以培养大师为宗旨的种种宏伟计划，若非另有所图，就是愚不可及。

从请名师的角度看（名师有具时名、名副其实之别，如今更有命名与成名之分），清华国学院所请的梁启超、王国维等，虽然各有长短，当时确已被指称为大师。在近代中国学术界，如果这几位不能当之无愧，可以候选的也就屈指可数。梅贻琦敢于宣称大学要有大师，显然与他们响亮的名头不无关系。其余包括首席国立北京大学在内，都缺少如此充沛的底气。或许梅贻琦的大师说，不无挤对没有或不敢称大师的北京大学之意。可是，清华国学院的几位大师，都没有大学的学历，也很难说是由大学培养的。梁启超只进过学海堂和万木草堂，王国维海内外的学历也很低，陈寅恪虽然读过欧美各国的多家名校却不取文凭，甚至没有注册，且从不称引师说。他以朱熹为楷模，对待域外文化，尽量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梁启超、王国维等过世后，清华国学院拟聘的几位大家，如章太炎、柳诒徵等，也都不是大学出身。而拿不到全美最容易拿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文凭的胡适，被认为是合格的受聘者，他敢于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而婉拒清华国学院导师的礼聘，不无自知之明。民国时期几位无所不能、号称大师如卫聚贤、郑师许等，在学术史上并未留下深刻印记，以至于今日学界知道其人其事者为数甚少。至于时下票选出来的国学大师或是打着国学大师旗号的风水先生，不过是大众的自娱自乐，江湖术士的故技重施，大都由自诩代表民意的各种媒体炒作出来，不必当真，也当不得真的。

进一步追究，出大师之外，即使是有大师之说，梅贻琦校长时的清华大学也不无可议。几位导师或亡故或离去后，硕果仅存的陈寅恪移席史学系，因主持系务的蒋廷黻主张社会科学化的新史学，力挺雷海宗，有逐渐被边缘化之嫌。只是由于他的学术声望高和人脉广，才不至于失势。至于雷海宗，虽然如今间或也被捧为大师，学术上毕竟不止略逊一筹。其对学